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新中国60年·学界回眸

文学发展卷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本卷主编 张颐武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新中国60年·学界回眸
文学发展卷



ISBN 978-7-200-08100-8



9 787200 081008 >

定价：39.00元

新中国60年·学界回眸

文学发展卷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本卷主编 张颐武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 京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中国 60 年·学界回眸·文学发展卷 /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组织编写; 张颐武分册主编.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9. 12

ISBN 978 - 7 - 200 - 08100 - 8

I. ①新… II. ①北… ②张… III. ①社会科学—科学研究事业—成就—中国—现代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C12②I20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237877 号

新中国 60 年·学界回眸

文学发展卷

XIN ZHONGGUO 60 NIAN · XUEJIE HUIMOU

WENXUE FAZHAN JUAN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组织编写

本卷主编 张颐武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北京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同文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7.75 印张 273 千字

2009 年 12 月第 1 版 200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 000

ISBN 978 - 7 - 200 - 08100 - 8

C · 525 定价: 39.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58572393

《新中国 60 年·学界回眸》

编 委 会

顾 问 满运来

主 任 常 卫 史秋秋

副主任 陈之昌 曲 仲 王祥武

编 委 (按姓氏笔画排序)

王振民 王祥武 文 魁 史秋秋

曲 仲 刘 勇 刘 娟 刘 蓉

杨 钢 李兴洲 李建平 张颐武

陈之昌 金梦玉 郑红霞 郑杭生

段 霞 施雪华 秦 宣 常 卫

崔新建 葛晨红 翟振武

本卷编委会

主 编 张颐武

撰稿人 (按姓氏笔画排序)

史 静 张 冲 张颐武 周 薇

郑 鹏 郝朝帅 徐 刚 徐 勇

葛亮亮 赖洪波



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书，是我们献给新中国 60 华诞的一份厚礼。

60 年光阴，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不过弹指一挥间；然而，新中国的 60 年，对中华民族的近现代历史而言，却可歌可泣，意味深长。这 60 年，彻底改变了自 1840 年至 1949 年一个多世纪间旧中国内忧外患的悲惨命运，使一个独立而强盛的新中国骄傲地屹立在世界东方。每一个为此作出贡献的团队，都会情不自禁地回眸自己一路走来的坚实脚步，为着风雨兼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带着这样一种理念和情感，我们策划了《新中国 60 年·学界回眸》这套书。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 30 年来，哲学社会科学不断繁荣发展，在认知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服务社会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对新中国的辉煌 60 年，从学界角度来理性思考、进行梳理，是首都社会科学界的光荣职责。经过多次与专家、相关学会负责人、出版社反复研究讨论，最终达成共识，将该套书定位在立足我国和北京改革开放实践的研究成果，以学界的视角审视 60 年来社会科学界的伟大成绩，着力总结 6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 年来哲学、经济、人口、社会、政治、法治、教育、文学、伦理、文化、新闻、国际关系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展示首都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提供的理论支撑。通过梳理和总结 60 年来各学科的重点事件，阐明各学科的重要理论建树，最终展现本学科理论上的重大成果，从而形成本学科理论和社会实践的互

动。

在本套书的策划过程中，我们组织多种学科的专家学者，深入探讨实现上述主旨的途径和方法，其中包括要尊重每种学科各具特点的发展状况，采用不拘一格的方式占有资料，归纳概括，著述成书。在实际撰写过程中，专家们虽都感到了创作的难度，但仍积极克服困难，努力完成任务，在此我们深表谢意。

书中难免有缺憾之处，恳望读者不吝赐教。

北京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09 年 12 月



目 录

导论：60 年文学发展	(1)
第一章 “新社会”和文学观念的转变	(19)
一、新中国文学意识的建构：“人民性”和工农兵群众的发现	(19)
二、走向统一的文学观：“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和文学意识的转变	(25)
三、中国文学研究与世界文学关系的新变化：苏联文学的影响	(34)
四、现代文学的学科建构和新的文学史意识	(41)
五、“新人”的塑造和“新社会”的表现：文学写作和文学批评 的发展	(46)
第二章 社会主义文学的发展和成熟	(54)
一、双百方针与现实主义深化	(54)
二、“两结合”创作方法的提出与创作的发展和转变	(59)
三、文艺思想的转变和社会的一体化：“典型”、“形象思维”等 问题的讨论及其意义	(66)
四、各种文学体裁的新的发展和变化	(73)
五、古典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变化	(79)
第三章 新时期的历史转折与文学研究的复兴	(84)
一、拨乱反正与文学的新繁荣：冲破“两个凡是”和“新时期文 学”概念的提出	(84)
二、现代文学研究的突破与思想解放	(92)
三、文学史研究的繁荣和历史遗产的再认识	(100)
四、西方文学传统的再认识和中国文学新时期的开端	(108)

第四章 文学观念的开放和创作的新的发展	(117)
一、文学与现实关系的再认识：现实主义和伤痕文学、反思文学 和改革文学	(117)
二、“现代派”讨论和文学形式的变化：意识流、象征主义 ..	(124)
三、“20 世纪中国文学”观念的提出和文学意识的变革	(131)
四、中国文学的国际视野的形成和对于传统经验的再开掘：“寻 根”与“文学试验”	(139)
五、迈向中华文学：台港澳和海外华文文学的学科建构	(146)
第五章 20 世纪 80 年代初步市场化和文学研究的变化	(151)
一、文学的市场化和“通俗文学”研究的建构	(153)
二、对于金庸、琼瑶和三毛的研究与新的文学市场的发展	(160)
三、“王朔现象”与文学失去轰动效应的研究	(166)
四、20 世纪 80 年代影视文化和文学互动作用	(171)
五、“新写实”和“新状态”：80 年代向 90 年代的过渡	(177)
第六章 20 世纪 90 年代的文学讨论与社会发展	(184)
一、市场化的深化与文学新的格局	(184)
二、“大众文学”和“纯文学”的不同发展路向	(191)
三、“人文精神”的讨论和后现代思潮的影响	(200)
四、社会变迁中作家创作心态的变化	(209)
第七章 20 世纪 90 年代文学研究的全方位拓展	(217)
一、学术规范与学科建设	(217)
二、文学史观的深化和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	(223)
三、现代文学研究的新的成就和影响	(231)
四、世界文学和比较文学的发展	(239)
第八章 新世纪文学的发展和文学研究	(245)
一、新世纪文学格局的再认识	(245)
二、新世纪文学学科建设的新的特点和新的趋势	(252)
三、新世纪文学“走出去”与文学研究的新发展	(256)
四、“80 后”写作及其新的走向	(260)
五、网络文学的发展及其研究	(267)
后记	(275)



导论：60 年文学发展

一

众所周知，“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最为基本的观念，正如卜正民和施恩德所指出的：“在 20 世纪，民族国家主导了各种政体和民族的组织方式和身份认同，其权威性和力量非其他的观念可比，与其他时代也很不相同。粗略地讲，民族国家是一个基本的观念，我们藉以认识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①而“民族国家”的追求，正是“现代性”的最为明确的表征。这和我们用来指称传统的王朝和帝国的“国”划定了鲜明的界限。正如汪荣祖所指出的：“国朝之国本于帝室，求一姓之绵延；民族之国本植于人民，求全民之荣华。同谓之国，固有异趣存焉。”^②“新中国”的建立，正是中国现代历史上“建国”这一强烈的独立的现代民族国家的追求的实现，也是中国告别了 19 世纪后期开始的国家主权的不完整和屈辱与失败的历史的重要的象征。其后的中国“大历史”的演变到今天，变化的轨迹有其内外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方面，中国内部经历了计划经济的建构到市场经济的形成的转变。另一方面，中国在世界上经历了由冷战时代的反抗当时的世界格局到加入和参与全球化进程的变化。而我们个人也经历了从追求“公民”的身份的“英雄”的表现到寻找“消费者”的“凡人”的表现。中国的“大历史”也由此发生了深刻的转折和变化。新中国也在自身的崛起中展现了“新新中国”的历史图景。中国文学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我们可以从新世纪的今天简要地回顾一下 60 年来的历史发展中的文化和文学的进程。

① 卜正民、施恩德编：《民族的构建》，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 年第 1 版，第 1 页。

② 汪荣祖：《史传说》，中华书局，2003 年版，第 13 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开始了中国历史的新的阶段。从五四运动发端的中国新文化也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以1949年7月2日召开的“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为标志的，这次代表大会虽然召开于新中国成立之前，但会议全面总结了中国新文学运动发展的历史，确定了中国文化发展的新的目标。“文艺为人民服务并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成为了当时新中国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这一指导思想对于中国文化的新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虽然经历过一些曲折和困难，但新中国的文化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当时，新中国处于“冷战”的国际环境之中，艰难地探索着自力更生的发展道路，动员全体人民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步建立了工业化的基础。而在这一过程之中，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也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它的功能是“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据统计，1949年中国的人均现金收入还不到100元，当然其文化的发展处于极低的水平。在这样的基础上，新中国文化服务于社会主义的建设，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发展非常迅速，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更多地参与文化创作的同时享受文化的成果。虽然受到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但文化建设和发展鼓舞了人民群众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奋发图强，努力奋斗。30年间，新中国已经建立了自己的完整的文化象征系统，初步建立了适应计划经济状况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体系，涌现了许多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艺作品，新的文艺人才也不断出现。感动过无数人，至今仍然保持着永恒魅力的被称为“红色经典”的许多新中国的优秀文艺作品也是这30年文化发展留下的弥足珍贵的成果。

改革开放的30年是中国社会全面高速发展的30年，也是中国文化全面高速发展的30年。这30年的文化发展让新中国文化进入了一个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繁荣时期。

从1978年开始，国家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向，“改革开放”成为时代的主题，由此开始了文化发展的新阶段。在1979年10月30日开幕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邓小平代表党中央作了《祝词》，全面总结了新中国成立30年来的文艺发展，并在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生活等方面作了重要的新的阐述。明确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文艺方向，为中国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创造进入了新的活跃的时期。进入21世



纪，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区分，而十七大报告则更将“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放到了重要的位置，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繁荣兴盛”的命题作了深入的分析。整个社会对于文化的意义和价值的认识更加深化，形成了新的文化的自信和自觉。

随着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的全球化和市场化的进程进一步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开始确立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卓有成效。文化体制的改革不断深化，精品力作不断涌现。文化市场和文化产业开始从无到有，快速发展。文化事业由于有了经济发展的支撑，也有了高速的发展。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举足轻重地位的凸显和中国在全球化中的影响力的扩大，中国的文化影响力和辐射力也不断扩大，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也有了重大的进展。2008年的奥运会既是体育的盛会，也是国家的文化发展成果的集中展现。在近期出现的全球性的经济危机中，中国的文化创意产业也一枝独秀，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

在60年新中国的发展的交响曲中，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同样是辉煌乐章。而在其中文学的发展也是其极为重要的部分。

二

学者约翰·哈特利在探讨西方的“现代性”时曾经指出：“消费者和公民这两者在整个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中一起成长。事实上，他们是现代性的一对连体引擎，离开这一个就不能理解另一个。这两个引擎是：对自由的渴望和对舒适生活的向往。”“对自由的渴望表现在公民身份之中，这是政府管辖的领域。”“对舒适生活的向往——不单是特权阶层或特权阶级，而是全体人口都能获得丰富的物质，使人们免于匮乏——这一梦想推动了19世纪的工业革命。这是商业管辖领域。”“自由和舒适的历史，是两个连体引擎间分化和融合的过程。”“这两个领域都可以形成自我。我们个体的身份认同是由公共和私人因素共同决定的。”而二者之间的划分构成了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区分^①。哈特利所指明的是西方社会“现代性”的状况。但“现代性”的这种基本的构造也对进入现代的中国产生了巨大

^① 约翰·哈特利编著：《创意产业读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版，第7-8页。

的决定性影响。对于中国来说,19世纪后期以来的主权的不完整所形成的“弱”的“民族国家”形象,使得“公民”的身份得不到实现,而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的危机所造成的“贫”也使得“消费者”的身份得不到实现。而“中国梦”就是这两个领域的持续的梦想,也就是超越“弱”得到一个“强”的国家,超越“贫”而进入“富”,使得个人的消费欲望得以满足。在20世纪的中国上半叶,残酷的民族危亡和现实的阶级斗争使得公民身份的建构的目标更加重要,而“消费者”的身份的实现也是一个一直持续的梦想。正如学者唐小兵所分析的,中国20世纪的“现代性”的追求是“英雄与凡人”的“辩证互动”。他指出:“正是20世纪中国的现代状况,在促成了英雄崇拜和对英雄业绩的向往的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安居乐业、温情脉脉的日常生活的怀念。一方面是对振奋人心的崭新生活的设计和憧憬,是乌托邦想象所激起的豪情壮志,另一方面,则是支离破碎、没有了常态的现实生活所带来的残缺、错乱感,以及由此而生的失落中对安稳、细腻人生的悉心体会和回味。”^①“公民”与“消费者”,“英雄”与“凡人”虽然领域和取向不同,却是一体两面地展现了“中国梦”的不同的走向的同时体现出现代中国在打造自己的认同方面的追求的丰富性。以这样的“公民”和“消费者”或者“英雄”和“凡人”的历史角度,我们可以切入“新中国文学”的发展和国家的发展、社会的转变的历史关联。

新中国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就主要以教育和动员社会,建构新的“公民”的身份为其努力的方向。

在“新中国”的历史情势下,社会在一种物质生活相当匮乏的环境中和相对孤立的国际环境中艰苦奋斗,为中国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初步工业化的基础和建构了国家的完整的象征系统。因此,社会对于个人的要求一方面是现实中需要将个人的消费压到最低的限度,将自身的日常生活的节俭变为现实的必然的要求。但另一方面,却将美好的生活和消费的可能性“延迟”到我们的后来者所生活的未来来实现。这样,社会通过今天的将全社会的人们“英雄化”来达到一个理想的社会建构的要求。这样,“新中国”文学的前30年就奠定了自己的基本的状态。一方面在内部凝聚社会的共识,让新的公民得以通过改造和转变在新的社会中得以展开自己的新的社会认同和身份塑造。这里有一些文学构成了一条踪迹分明的主

^① 唐小兵:《英雄与凡人的时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版,第2~3页。



线。另一方面，则在“冷战”的环境之下，强调世界局势的紧张和“新中国”所面临的挑战和困难，强调以革命的精神克服困难和挑战。这里的“中国梦”就是一个国家以集体性的选择，来追求自身的强大的梦想。当然，在文学的实践中，在消费者和公民之间的平衡也依然是计划经济时代文学的结构中难以排除的，虽然革命的激情在追求新的表现形式，却由于中国的历史条件的限制而无法彻底激进化。革命的理想当然是塑造公民的身份的基础，但“消费者”的凡人的美好的日常生活却也始终是社会对于未来的承诺。这样的文化和社会状况要求文学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服务。新中国的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呈现出下述的鲜明的特点。

首先，革命的历史的叙述和在革命历史中的“英雄”的成长是“新中国文学”的关键主题。这里革命历史的叙述，是向全体公民普及革命的历史，让公民了解革命的艰难和必然，了解“新中国”建立的历史的要求。同时也通过革命中英雄的成长让人们看到英雄乃是由普通的民众成长而来的，他们在压迫下产生的朴素的阶级和民族情感让他们有了革命的基础和先决条件，而他们在革命中的锻炼和学习让他们成为了英雄。在革命的艰苦的极限考验之下，经受了磨难和牺牲的人才是英雄，这些以革命历史和革命英雄的成长为中心的作品，其实是通过培养公众对于革命和革命英雄的认同达到对于“新中国”的认同。“新中国文学”的许多经典作品就是在战争和艰苦的革命斗争的环境下的人的成长的经验。如《红旗谱》《红岩》《青春之歌》这样一些经典之作就是塑造“英雄”成长的历史和革命的现代历史相联系的经典之作。

其次，则是通过对于“新中国”的日常生活中的平凡而伟大的英雄的肯定来超越日常生活的平庸性和消费的诱惑，以此来克服匮乏所造成的经济和生活方面的挑战，能够以精神的超越性和革命的激情来显示出社会的认同的力量。在这里，消费者的身份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转换成为了一种未来的承诺，一种先解放他人之后的必然的历史的结果。消费者或凡人的美好的日常生活是中国“富强”的理想实现后的必然的归宿，是历史的目标实现后的事情，而实现历史的目标则需要今天的牺牲和承诺，需要今天的英雄行为。因此，公民的身份的建构就需要通过对英雄的认同而超越生活的平淡无奇，每一件小的好事都被赋予了异常重大的意义，因此，“平凡而伟大”的感受，一种在日常生活的平淡经验之中发现英雄的行为和事迹的坚韧的努力一直是塑造新的公民的需要。在前30年的“计划经

济时代”，距离革命战争年代越远，则对于这一方面的敏感就越强烈，忧虑年轻一代由于缺少旧社会的经验，因此缺少远大的理想。这其实也是在冷战的全球格局之下，中国社会的必然的选择。因此，从50年代开始就有一系列关于当时社会生活中普通人的成长和社会建设的作品，其实都具有这样的意义。譬如《创业史》《艳阳天》以及诸多工业题材的作品都具有这样的意义。

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多重挑战，在冷战的格局所造成的相对封闭环境下进行新的国家的创造，其文学想象就必须将新的“公民”的塑造和英雄的表现作为自身的中心，它就没有条件和可能，也没有具体的历史环境来充分表现“消费者”和“凡人”的方面，虽然也呈现了新生活进步和发展，但比较起来其表现的程度和深度不充分，一些这方面的表现甚至受到了批判和否定。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计划经济时代的文学写作是以对于“公民”的政治性的动员为中心，以社会建设和反抗既成的世界秩序为目标的。它所致力的是国家的象征性的建构和国家的新的精神的构造。因此，它在满足人们的日常的需求方面似乎有所不足。一方面，这一时期的文学在表达国家的合法性和英雄的塑造方面有重要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在表达公众和社会的多方面的需求方面仍然有自身的缺陷，其问题就是在于社会生活之中的消费者和“凡人”的正当的需求和物质和精神的愿望还不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

而在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的30年之后，中国在70年代末期开始了向“市场经济”的大转型。中国也开始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后30年的文学开始了它的新的历程。由“伤痕文学”开始其实打开了通向市场经济之门。

“伤痕”文学所表现的是一种创伤的记忆，是“文革”时代对于人们的伤害和摧残造成的心理和文化的“伤痕”的展现。在这里，被出卖的青春，被蒙蔽的天真的永远失落对于心灵的伤害，这些痛苦的主题是“伤痕文学”中最为强烈地凸显的中心。如《伤痕》中的王晓华、《班主任》里的谢慧敏、《醒来吧，弟弟》中的弟弟都是被“四人帮”的虚假的“革命”的激情所蒙蔽，而造成了价值的错乱和日常生活的扭曲，这导致了他们的家庭关系的破坏，和亲人的感情永远无法弥补的创伤。这些作品所展示的是“文革”带来的危机和困境中的重建价值的尝试。“伤痕文学”回到个人的命运，展现了一种感伤的精神情绪，也有抒情性的展开，凸显了个人的感情的存在，生活的细节开始回到小说之中。人们一般认为，“伤



痕文学”是70年代末期直到80年代初期主导小说发展的主要的潮流。到80年代初期，“伤痕文学”发生了演变。如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张贤亮的《绿化树》标志“伤痕文学”的发展，它们都显示了与“反思文学”的结合。一般文学史认为，“伤痕文学”标志新时期文学的真正生成，是新时期文学的起点。有人认为“伤痕文学”艺术上比较不成熟，局限性较大，艺术评价较低。但“伤痕文学”显然开启了“个人性”写作，为新的“现代性”的展开奠定了基础，也标志着对于一个新时代的渴望。与“伤痕文学”同步的是“反思文学”。“伤痕文学”所透视的是“文革”所造成的伤痕，而“反思文学”则试图对于“文革”的历史背景和中国20世纪以来的历史进行比较深入的反思。试图从个人发展的角度透视历史，看到历史深处的“封建”的影响，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一个重要的参照。“反思文学”的代表作有《剪辑错了的故事》（茹志鹃）、《李顺大造屋》（高晓声）、《内奸》（方之）、《相见时难》（王蒙）、《小贩世家》（陆文夫）等作品。这些作品试图通过对于中国当代历史的再度叙述提供一种新的文化想象来清理和反思中国剧烈变化的历史，由此凸显一种新的“个人”的出现的必要性。而在70年代末期，伴随着改革的开始，中国的新的的发展从农村开始席卷全国，这时出现了表现中国的改革所遇到的现实的阻力和冲破阻力的努力的“改革文学”。这是以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为代表的。其中还有表现农村变化的《乡场上》（何世光）、《黑娃照相》（张一弓）等作品。

在“新时期”开始之后，形式方面的探索也已经成为小说发展的新的路向，对于西方“现代派”的技巧的挪用也已经成为小说形式方面尝试的重点。如王蒙的《布礼》《春之声》等通过对于“意识流”手法的借用来发展中国式的抒情小说等都是引人注目的实验，而高行健的《有只鸽子叫红唇儿》也对于形式进行了更为激进的尝试。

而到了1985年，伴随着中国社会变化速度的加快和思想解放的加深，文学的发展也呈现出以徐星的《无主题变奏》和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为代表的新的更加激进的“现代主义”的文学尝试和以王安忆的《小鲍庄》、阿城的《棋王》等作品为代表的“寻根文学”的潮流。刘索拉和徐星的作品开始涉及中国都市的新的生活方式和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年轻一代的新的思考和价值选择。而“寻根文学”则试图通过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对于传统的压抑性进行深入的表现，通过认识一种超越时间性的“传统”对于人们的生活的影响的关注来反思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问题。80